

弈境

围棋与中国文艺精神

何云波◎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G891.3

67

2006

弈 境

——围棋与中国文艺精神

何云波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弈境:围棋与中国文艺精神/何云波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1
ISBN 7-301-09588-0

I. 弈… II. 何… III. 围棋—关系—文艺—研究—中国
IV. I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8299 号

书 名: 弈境——围棋与中国文艺精神

著作责任者: 何云波 著

责任编辑: 黄瑞明

标准书号: ISBN 7-301-09588-0/I · 075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bing@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7

排 版 者: 北京华伦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 者: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8.375 印张 248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 1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何云波，男，生于1963年。先后就读于湘潭大学、四川大学，获文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现为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湖南省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会副会长。为湖南省首届优秀青年社会科学专家，并被确定为湖南省“百人工程”和“121人才工程”培养对象。主要从事俄罗斯文学、比较文学和围棋文化研究。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两项，获教育部和湖南省社科成果奖四项。文学著述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文化精神》、《肖洛霍夫》、《回眸苏联文学》、《对话：文化视野中的文学》、《跨越文化之墙——当代世界文化与比较文学》等，围棋著述有《围棋与中国文化》、《天圆地方》、《棋行天下》。在《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国外文学》、《中国比较文学》等刊物发表论文九十余篇。

序 言

陆建德

我和云波是1997年秋认识的，当时我们一同在苏州大学参加一次外国文学研讨会。此前，我曾读过云波发表在《外国文学评论》上的论文，对他的学识很是佩服。那一年，云波才34岁，刚出版了他的专著《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俄罗斯文化精神》，意气风发。会上同事告诉我，这位年轻的湖南学者嗜爱围棋，出差在外也不忘带上棋具。经过《世界文学》编辑部主任李政文先生的撺掇，我和云波摆开了棋局。从此我们结为契（棋）友，每次见面都要手谈一番。

说来惭愧，我的棋龄已近40年。大概是在1966年春节，二哥涪江回杭州建德村探亲时教我下棋。后来沈良斋和任旭园两位老先生先后把他们珍藏的《围棋》月刊和一副相当不错的棋具送给我，进一步激发了我的兴趣。“文革”“停课闹革命”期间，我常去杭州柳浪闻莺公园茶室观棋，运气好的时候能看到张礼源、董文溯等名手对弈。我感到不大习惯的是高手下棋时竟然盘外招用得很多，形势占优了就会盯住对手唱起京剧《沙家浜》中“指导员”的台词来：“这时的心情不难体谅。”公园里的棋手，大都自信好强，经常出言不逊。我不敢在这样的环境下经风雨，于是只能退回建德村，与同伴交手。

我虽然喜欢围棋，但只是把它视为逞能争胜的游戏，可以宣泄不良情绪。好友间偶尔失态，可以得到原谅。与陌生人斗气，是很难为情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读到一篇关于国际象棋的文章，写得非常有趣。这位英国作者说，棋类运动是心理战，其残酷的程度比拳击有过之而无不及；棋手的一招一式都以侵害、制服对手为目的，种种恶毒的办法都想得出来，手段高明者实为“像苏格拉底一般聪明的恶棍”。从9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的围棋刊物爱用一些赞美围棋并

把它与修身养性相联系的文字。出于一种自嘲的精神,我向《围棋》月刊推荐那篇英国散文。这是败兴之举,杂志编辑部自然不予理睬。由于对棋既爱又恨,加上天资不足,我的棋艺久不见长。每次对弈,下半盘总是松松垮垮,还要搬出唐寅的诗句做借口:“懒算输赢信手棋。”其实,不长棋就和苏格兰小说家巴里笔下的男孩彼德·潘拒绝长大一样,也很快活。

云波的棋龄,恐怕不及我一半。他学棋晚,进步神速。每次与他对局,我都意识到他的棋力日强。勉强招架之余,我深知自己很快就不是他的对手。对此我倒欣然。苍天有眼,无怨无悔的爱棋人应该得到眷顾。云波曾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有一种为俄罗斯文学所特有的沉重、热狂和悲怆,这个世界对他而言十分遥远,值得敬佩而无法亲近,即使陀氏遥指一个美好的天国,他也会在天国前却步。我想,云波这番话表明,在拯救与逍遥之间,他宁取逍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围棋之间,他选择围棋。他的书房取名“潇湘听弈庐”,这就是明证。跟了魅力无限的“木野狐”上天入地,他也认了。前几年,我听说云波决定攻读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很为他高兴,但当我得知他将从比较文化的角度来研究围棋时,我还是略感惊讶。作为我国“围棋博士”第一人,云波已出了《围棋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和《棋行天下》(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两本著作,还编选了围棋文化散文集《天圆地方》(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本书是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改就的,与《围棋与中国文化》一书形成一种互补的关系。云波研究围棋文化,成就斐然。作为比较文学专业的教授,他还在探究19世纪俄国小说中的城市形象。他的才气和精力确实令人钦佩。

读了云波几本关于围棋的著作,我也有些感想。围棋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不是我的关心所在。对阴阳八卦之类的语言,我历来敬而远之。我们如何看待围棋,也许更值得关注。下棋有助于思维,这应该没有疑义。诚如范西屏在《桃花泉棋谱》的序言中所说,“心之为物也,日用则日精。”但是我不相信发明或喜爱黑白世界的民族具有特别的智慧。同时也要看到,日本进入江户时代(1603—1868)后,对围棋的发展和推广贡献最大。打本因坊道策的棋谱就会发现,我国

清代国手对围棋的认识,还稍逊一筹。座子制加上布局时的陈陈相因大大局限了中国棋手的想像力。现在韩国执围棋世界牛耳,个中原因是值得我国文化研究认真检讨的。

指南针可用于看风水,也能用于航海。在不同的文化氛围中,围棋的意义和用途是全然相异的。上世纪80年代,我们把围棋与国运和民族精神联系起来,个别棋手几乎成为中华复兴的象征。这或许说明,我们当时还是有自卑情结,竞技场上每一次胜利,都要做足文章。“弈”本为“小道”,哪里担负得了政治的重任?围棋在那时让人变得太忙太闹,而古人则说“棋令人闲”。中国历史上闲云野鹤式的逸致经常是文人吟咏的对象,但是“闲”错了地方也会贻误大事。在晚清官员中,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名声还算不错。我们在他的《出使英法俄国日记》中发现,这位大清国的外交官精通“琴棋书画”四艺,对围棋尤其痴迷,出任公使后依然在围棋上耗费大量时间,有时一日下棋达五局之多。我有时觉得他体弱多病,智识活力不足。面对一个全新的世界,他显得缺乏应有的兴趣与热情,不去描述,无力描述,于是围棋成了他寻求慰藉的避风港。当时欧美外交官和传教士(如已回英国的威妥玛和还在中国的李提摩太)何等勤奋,他们了解认识异文化的热情以及对文化交流的实际贡献远非围棋爱好者曾纪泽能比。

我们还要看到,在很多民间高手中,围棋是设赌的工具,带来具体好处的手段,古今皆然。本书介绍的《二刻拍案惊奇》中的《小道人一着饶天下 女棋童两局注终生》就是一个例子。云波在分析这故事时强调了中国文化“世俗”(他直接用了“俗”字)的一面。与“世俗”的围棋观对立的,是日本小说家川端康成在作品《名人》里所着意刻画的棋道。1945年8月6日,广岛遭原子弹袭击,然而核爆炸居然未能中断桥本宇太郎与岩本薰正在进行中的本因坊决战。这两位九段视荣誉高于一切,进入了物我两忘的境界,他们所表现的或许就是棋道的极致了。我相信,如有必要,两位棋士还会毫不犹豫地以死来达致生命之美,围棋之美。云波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国前却步,棋道也是一种值得敬佩而无法亲近的精神吗?

今秋有望去长沙。我已在想像中做客“潇湘听弈庐”,茶一杯,棋

一局。“一枰坐对，万虑俱清。”逍遥的人生观也有可取之处，它比较宽容，颇合人道。然而，要使我们的生活张弛有度，逍遥是不能胜任的。我愿意以此与棋友们共勉。

2005年8月26日于北京东郊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弈与艺	11
第一节 弈之为艺	11
第二节 弈、艺与中国古代知识谱系	33
第二章 弈与道	58
第一节 周天画地	58
第二节 制胜保德	74
第三节 技进乎道	89
第三章 弈与文	104
第一节 弈与文通	104
第二节 诗境与弈境	117
第三节 小说与围棋	131
第四章 思与言	145
第一节 道与术	145
第二节 玄象与数理	160
第三节 雅俗之间	173

第五章 游戏精神与艺术精神	190
第一节 游戏与艺术.....	190
第二节 手谈与对话.....	202
第三节 弈境与艺境.....	214
 结 语.....	240
参考文献.....	245
后 记.....	257
补 记.....	259

绪 论

—

“此局白体用寒瘦，固非劲敌，而黑寄纤穠于淡泊之中，寓神俊于形骸之外，所谓形人而我无形，庶几空诸所有故能无所不有也。”^①

“化机流行，无所迹象；百工造极，咸出自然。则棋之止于中正，犹琴之止于淡雅也。”^②

这两段话分别出自清代国手徐星友和施定庵。以诗文的审美标准来论弈，弈与艺、文，也就取得了沟通。

围棋本来是一种竞技性游戏。当这种“技”与“戏”更多地与精神的愉悦、人生的解悟联系在一起，也就具有了审美的意义。琴棋书画，围棋，也就成了艺术家族之一员。

而到 20 世纪，围棋又被纳入体育竞技体系中，逐渐丧失了“艺”的身份。这固然与围棋本来的

① 徐星友：《兼山堂弈谱》，见《围棋古谱大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第 669 页。

② 施定庵：《弈理指归》·序，见《中国围棋》，蜀蓉棋艺出版社，1985 年，第 236 页。

竞技成分有关,另一方面,也是文艺乃至整个社会的“世界化”潮流使然。20世纪全球范围内的世界化,使各区域文明日益被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艺术的“区域性话语”日益被“世界性话语”所取代。而这种“世界性话语”又往往是西方意义上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

20世纪的“世界化”事实上就是“西化”,20世纪的世界性要求就是西方现代文明的要求。正是这种要求注定了20世纪处于同一世界中的东西方艺术之间不平等的关系,即向西方认同的关系。在此关系中,作为西方现代文明之一部分的西方现代艺术是被这个世界所认可的唯一合法的现代典范和尺度。换句话说,20世纪艺术的现代性是以西方现代艺术为尺度和参照的,因此,对20世纪非西方艺术而言,所谓的“世界性要求”不外是西方现代艺术所确立的艺术观念、态度和话语方式。^①

在这种“世界性”的大潮中,中国传统知识谱系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就日益“西化”了。中国的“文”与“艺”本来都有自己独特的内涵。受西方艺术分类体系的影响,中国传统的“艺”与“文”,也就逐渐被西方意义上的“艺术”与“文学”所取代。围棋,这门古老的艺术,也就在现代“艺术”中消失了踪影。

其实,自汉班固撰《弈旨》以来,中国围棋留下了丰富的美学遗产,且不少都是文人所为,如马融、沈约、皮日休、苏东坡、王世贞、袁枚、李渔等。中国棋论与文论及其他艺术理论在价值取向、话语方式上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可是,在20世纪艺术“世界化”的大背景下,文论、乐论、书论、画论研究者众,而有着丰富的哲学、美学内涵的棋论,却基本上被置于学术视野之外。各种在西方知识体系中建构起来的“艺术概论”,自然不可能有“棋”的一席之地。令人奇怪的是,专论中国传统艺术的著作,也难见“棋”的踪影。倒是在各种《中国体育史》中,可以找到“中国围棋”。而像最近新出的四卷本的《中国审美文化史》^②,囊括了诗歌、散文、戏曲、小说、琴、书、画、舞、工艺、雕塑、

① 余虹:《艺术与精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69页。

② 陈炎主编:《中国审美文化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

园林、服饰、墓葬、民俗、饮食等,单单对“棋艺”一字不提。

与此相应,20世纪,对围棋本身的研究,也是更多地集中在作为竞技的围棋中。围棋技术类书籍层出不穷,围棋文化研究,则相对薄弱。在围棋史研究中,中国内地及台湾共有4部中国围棋史著作,如《围棋史话》(李松福,1990),《中国围棋史》(张如安,1998),《中国围棋史》(蔡中民、赵之云等主编,1999),《中国围棋史话》(朱铭源,1992)。它们清理了中国古代围棋的渊源、流变,但缺少对围棋与中国文化、艺术关系的整体把握。

另一种研究,则是对中国围棋文化遗产的清理。中国出版过不少中国围棋古谱。而《中国围棋》(刘善承主编,1985)和《围棋古谱大全》(盖国梁等编集整理,1994)收集了不少中国围棋古谱、棋论、围棋史料、围棋文学作品等资料。成恩元先生的《敦煌碁经笺证》(1990)和李毓珍先生的《棋经十三篇校注》(1988),则对中国古代的两部围棋理论著作《敦煌碁经》、《棋经十三篇》做了细致的校释、考证。胡廷楣先生的《境界——关于围棋文化的思考》(1999),从围棋源头、围棋思维、“语言”、虚实、围棋的境界等方面展开对围棋文化的思考,颇有新意,但不少文章多为访谈性质,其研究有待于更进一步的深入。而对围棋与中国文学、艺术关系的清理,除了一本《围棋文化诗词选》(蔡中民选注,1989),其理论研究,则基本上付诸阙如。

日本是围棋的第二故乡。它从中国接受了围棋,又将其发扬光大。金克木先生说:“日本棋士是专业,着重争斗、胜负。中国人下棋多是作为业余,含有表演意味……日本棋士是战士。中国棋士是艺人。”^①日本视棋道为艺道、武士道乃至宗教之道,它建立了完备的竞技体制,由此极大地促进了竞技围棋的发展。但有一种说法,当今日本围棋的滑坡,又是因为过于追求“艺道”,追求围棋的艺术之美。而韩国围棋独霸世界棋坛,乃是实利主义对理想主义的全面胜利。韩国棋界正集体签名,请求把围棋从文化局划归体育局,据说已正式得到“体育”的接纳。中国围棋曾经在很长时间里把围棋当做游戏、艺

① 金克木:《幻庵棋士乘船来》,见何云波选编:《天圆地方——围棋文化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209页。

术,但也因此限制了竞技围棋的发展。20世纪,中国围棋终于汇入“世界性”的大潮中。

二

当某种事物汇入以现代化为标志的世界性大潮中,固然使它获得了发展的机遇,但同时也可能使它固有的一些东西被遮蔽。中国的文化、文学艺术如此,中国围棋也是这样。

笔者曾在《围棋与中国文化》^①一书中,从围棋的本质、围棋与东西方文化、围棋的源流、弈具、弈制、围棋与中国哲学、宗教的关系、中外围棋交流等方面,试图在中国文化的视野中对围棋做一次较全面的探讨。在追踪围棋文化的源流时,就想进一步从艺术的角度对中国围棋做些梳理。编选《天圆地方——围棋文化散文选》^②,权作一种资料的准备。而做《围棋与中国文艺精神》的研究,目的倒不是非要把围棋重新拉回到“琴棋书画”的传统中,而是为了清理一下中国古代围棋及围棋理论所包含的丰富的美学遗产,同时将围棋及棋论放在中国文化及艺术理论的大系统中,看看围棋与中国传统的“艺”与“文”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不敢说因此就能建立一套“中国围棋美学”,只不过想为中国文论、艺论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参照。当人们致力于建构中国文艺美学时,不妨关注一下那些被遗忘的“艺术”。

本课题算得上是一种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当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因为其重心不在文学,而是以中国传统的文、艺及文论、艺论为参照,展开对中国古代围棋及棋论的研究。其重心在探讨围棋作为一种艺术,其意义的生成、建构过程。

“弈”之为“艺”,与其他各种“艺”有共通性,又有其特殊性。它与医、卜等各类“术艺”一样,都是一种“技艺”。与琴、书、画为伍,则更多地带有精神的、审美的因素。但“弈艺”作为一种竞技性的游戏,首

^① 何云波:《围棋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中国文化新论丛书”,2001年。

^② 何云波选编:《天圆地方——围棋文化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

先,它是一种行为艺术。下棋的行为、过程,本身就是围棋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它与音乐、舞蹈一样,有时是直接面对观众的,带有表演性。其次,弈地往往构成围棋艺术之“境域”。“松下围棋,松子每随棋子落;柳边垂钓,柳丝常伴钓丝悬。”不同的人对弈地的不同选择,常常折射出各自的审美情趣,也影响到棋局的内容。其三,当对局结束,棋谱被记录下来,便成为一种供人阅读的“文本”。

如果把棋谱当做一种艺术性文本,它与文学文本之间,便有了诸多可比之处。围棋被称为“手谈”,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不借助于文字的特殊言说方式。中国文论有不少“言、象、意、道”之辨,围棋则是直接“以象尽意”。文学文本多是由个人创造的,棋谱则是对局者双方“对话”的结果。对话双方是一种对立、冲突关系,但在共同创造一件完美的“艺术品”时,又需要一种更高意义上的和谐。在棋局的进行过程中,每一招棋都可能有许多种选择,每一种选择都将决定棋局的不同流向。因而,棋谱作为一种“文本”,既是封闭的(就棋局的进程、胜负而言),又是开放的(就棋局背后隐藏的多种可能性而言)、可写的(就阅读者而言)。

研究“弈”何以成为“艺”,弈与中国传统的艺、文之间的关系,便构成了一种跨学科的对话。而对话的前提是对各自知识体系中的概念范畴、话语规则的梳理。由于其研究对象分别是诗、文、书、画和作为四艺之一的围棋,研究对象的差异,便构成了各自的一套概念体系。而它们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很多概念又是相通的,如道、技、艺、气、韵、形、象、意、阴阳、玄、妙、神、仁义、动静、虚实、奇正、体用等等。但它们在文论、棋论及其他艺论中,其具体内涵又是有差异的。比较研究,首先需要对其概念范畴做一番细致的辨析。正像“气”,气是围棋棋子生存之本,而文学亦强调“文以气为主”,棋论、文论、书论、画论都讲“气韵生动”,其内涵既有联系又有差异。这就需要在跨学科研究中寻求话语的沟通时,先做一番细致的辨析。在清理概念和言说方式的基础上研究围棋艺术的意义生成、展开的方式,从而使研究不至停留于表面现象的罗列,而有可能走向深入。

问题是,如果说在同一国家或民族中,不同艺术、学科可以共用一套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话语,而在他种文化背景下,可能又完全是

一套新的话语。正像中国哲学及艺术论,都常有浓厚的体验感悟及诗性表达的特色,西方则偏重逻辑分析与理性表达。人们习惯于把这两种知识形态称之为“感悟型知识形态”和“理念型知识形态”。就是说,中国传统知识更具诗的色彩,西方传统知识更接近于科学。正像亚里士多德,他以“求知”、“观察”、“追问”、“推论”为支点,确立了西方知识话语的科学理理解读模式及以逻辑分析方法为主导的意义生成方式。^① 而中国以道、气韵、风骨、境界论诗文书画,决定了中国的“文”与“艺”有自己独特的质地、品格。中国与西方传统的“文”与“艺”,乃是两个各自独立的系统。美国学派首先倡导的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其学科分类,其对“文学性”、“艺术性”的界定,依据的是西方知识体系。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显然不具有‘对话’的视野,它所确认的学科目标(‘世界文学’)依据西学传统对‘文学’、‘文学性’、‘诗性’的领会和规定。对美国学派而言,‘比较’并不是一场文化间的对话,而是以西方‘诗学’的眼光对各种文学经验及其理论表述的发掘。……它所确认的‘综合’、‘类比’、‘跨学科’等研究方法在同一文化圈的比较研究中有极大的用武之地,然而在跨文化研究中,由于相异文化中的文体分类、学科分类极不相同,乃至文学现象呈现出全然不同的边界归属,这些研究方法已很难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核心方法。相反,对不同文化中文学经验和文论思想的异质性的考察将成为跨文化比较文学研究的重心。”^②

美国学派完全承续欧洲文论传统的话语,用模仿、表现、典型、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来探讨文学,规定文学的特性,而像中国、印度等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所采用的一些基本的文论概念,比如气、韵、味、境界,都被排除在其视野之外,那么,作为跨学科研究之出发点的“文学”、“艺术”,就只能完全是西方意义上的。而跨学科研究的“学科”分类,也是源于西方知识谱系。在这个前提下的跨学科研究,也就常常是单向的,不具有对话的意义。正像中国的诗词歌赋、戏曲、话本小说、琴棋书画,由于与西方文学在精神特征上

① 曹顺庆:《中外文论比较史(上古时期)》,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87页。

② 曹顺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巴蜀书社,2001年,第301页。

相距甚远,也许,在西方人看来,它不过是用于了解东方神秘文化的标本,并不具备跨学科研究中的“文学”、“艺术”的意义。

由此,在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中,引入跨文化的视野,便势所必然。跨学科对话的实现,首先需要在跨文化的背景上,弄清文学、艺术及其他学科在人类文化知识架构中的位置及其演变。显然,“艺”与“文”作为两大系统,只有弄清它们在中西传统知识谱系中的位置及其相互关系,它们与中西文化传统、精神的联系,在这种跨文化的背景上,跨学科研究才能有一个坚实的基点。如果仅以某一知识体系中的“文”与“艺”作为唯一的标准,便有可能导致对另一种文化中的某些“文”与“艺”的遮蔽。正像琴棋书画,作为中国古代四艺,到20世纪,“棋”已被排除在现代“艺术”之外,这固然与围棋日益走向竞技化有关,但也是因为它与西方艺术体系不合使然。而中国围棋所包含的丰富“艺”与“美”的内涵,也就在西方知识的“前见”之下,被遮蔽了。

三

寻根,回到事物本身。

要寻求东西方文学、艺术间的沟通、对话,也许首先需要立足于各自的“文学性”、“艺术性”,跨文化、跨学科的比较文学研究才有坚实的基点。

有学者指出:“没有跨文化比较研究的视野,没有返本溯源、回到不同文化中的不同文学样态的‘文学性’这一回到‘事情本身’处的胸襟和气度,我们就不可能‘发现人类共同的诗心’,不可能建立普遍有效的文学理论。”^①

文学如此,艺术亦然。

建构中国自己的文艺美学,需要“返本溯源”,对我们曾经拥有的文学、艺术遗产做一番清理。围棋,便是属于一种被忽视的“艺术”。

本课题要研究的就是“弈”如何成为“艺”的,不同时代的人如何

^① 曹顺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巴蜀书社,2001年,第301页。